

變遷中的當代中國文武關係

• 郝詩楠

直至毛去世前，〔軍隊的〕職業主義或現代化並未受到重視……但使得中國在文革中不至於遭受解體的力量正是職業主義及其基本價值。

——約菲 (Ellis Joffe) ①

中國當代文武關係的核心無疑是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本文試圖梳理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再到後鄧時代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其基點是軍隊的角色衝突和身份的重構。

許多學者研究中國當代 (尤其是後鄧小平時代) 政治時，往往只注重對文官體系的分析，也就是說關注點一般都在黨、政府—官僚機構之上。也有學者關注社會層面，以非國家行動者為切入點來研究中國政治。他們往往把軍隊當成了一個「常量」，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它。然而，有學者認為，後鄧時代的黨和軍隊有可能出現制度上的分立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軍隊有可能變成一個預測和解釋中國政治發展的「變量」，因此借用比較政治學中所謂「國家中心論」學派的「找回國家」的呼籲，提倡在中國政治研究之中要「找回軍人」(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 ②。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討論中國當代 (指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 的文武關係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其核心無疑是共產黨與軍隊的關係。「文武

關係」是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制度研究之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文官體系與掌握國家暴力機器的軍隊之間的互動方式，所關注的是「文官體系是如何建立以及維持對於軍隊的控制」③。本文試圖在歷史與理論探討的基礎上，梳理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再到後鄧時代中國文武關係的變遷——其基點是軍隊的角色衝突和身份的重構。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軍隊」所指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而不涉及武警、民兵等其他軍事組織。

本文首先回顧中國歷史上「文官至上」傳統的建立、破壞與重建，並在綜述文武關係理論的基礎上，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控制軍隊的主要方法與手段。接下來對比了毛時代與後毛時代 (包括後鄧時代) 的文武關係，描述了其變遷的軌迹並論述了軍隊雙重角

色(或身份)之間的張力。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儘管在後毛時代軍隊重新啟動了職業化進程，走上了「回歸本職」的道路並逐步開始出現自身的利益；尤其在後鄧時代，其自主性以及與文官體系的分歧逐漸增加，但是中國的軍隊仍然是一個政治化的體系，其與文官體系的分歧僅是一種在「黨治體系之內」的文武分化。

一 中國的文武關係： 歷史與理論

(一) 歷史的考察

從歷史上看，中國有着較強的「文官至上」(civil supremacy)傳統，這源於傳統王朝國家長久的穩定。所謂「文能安邦，武可定國」。一般來說，在古代的中國，治世所持續的時間長於亂世，所以統治集團向來突出強調文官體系的重要性。其次，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注重教化的作用，因此也崇尚文人(德性)治國；相反，武官則更多地代表着魯莽和非理性，「一介武夫」這個謙辭便能表現出武官從屬於文官的思想傳統。因此，中華帝國的多數子民都以進入文官體系為榮，而「武狀元」則多遭(尤其是文官的)鄙夷。此外，這種「文官至上」的傳統也相應地發展出了多種制度，用以保障文官——最終是皇帝——對武官體系的控制，諸如領兵權與發兵權的分離等。

在與西方的堅船利炮衝突並且海通以後，中國又重新進入了一個百年「亂世」，武官的作用又重新被重視。清末對於新軍的建設，逐漸將權力從文官體系轉移至武官集團。而辛亥革

命之後的中國政治格局更是進一步打破了傳統，以地方主義和分散化暴力為特徵的軍閥割據體制取代了傳統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愈來愈多的武人攫取了政治權力，軍事在某種程度上統帥了當時的政治。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作恢復「文官至上」傳統的一種努力，但是這一努力是失敗的。因為國民政府從本質上來說還是一個軍事獨裁政權，軍隊作為一個派系，在中央政務體制之中擁有很大的與文人政治家抗衡的話語權；而在地方上，軍閥的殘餘勢力並未肅清，並且處於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外，南京方面不得不用妥協的態度來面對地方勢力。

其後，中國共產黨則在另一條路徑上試圖恢復文官體系對於軍隊的控制。共產黨的領導人充分認識到海通以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原則以及軍人集團自外於文官體系控制的弊端，決心用更加強力的方式來控制軍隊。共產黨採用列寧主義「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提倡「以黨統軍，寓黨於軍」，將黨的組織建立在軍隊最基層的單位之中，通過意識形態以及人事等手段，成功重建了將軍隊置於文官體系的控制之下這一被打破了的傳統。

(二) 討論與爭論

從理論看，在西方學界討論文武關係的諸種文獻之中有兩個重要範式：政治化(politicization)與職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前者指的是一種捲入政治的軍隊；而後者則相反，它與軍隊脫離政治的「中立性」相聯繫^④，講求的是軍隊的「非黨化」、「不介入政治事務」，以及「只聽命於合法選舉

共產黨採用列寧主義「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提倡「以黨統軍，寓黨於軍」，將黨的組織建立在軍隊最基層的單位之中，通過意識形態以及人事等手段，成功重建了「文官至上」這一被打破了的傳統。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和政治話語之中，軍隊一直擁有着雙重身份：它既是保衛國家的暴力機器，又是從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它也同時具備了政治化與職業主義兩個面向，因此有學者將解放軍稱為「具有職業屬性的黨軍」。

產生的政府首腦和國家元首」^⑤。可以說，前者是一種政治化的軍隊，後者則是一種專注於軍事業務的職業化軍隊。西方學者對於文武關係的分析基本上基於這兩種範式。

而另一種分析文武關係的理論，則是基於對軍隊干政程度的描述。比如波蘭學者懷亞特 (Jerzy J. Wiatr) 就構建了一種從從屬性到自主性的軍隊角色光譜。根據他的論述，軍隊之於文官體系的角色可以分為五種類型：國家公僕、壓力集團、政治勢力、國家監護人與精英統治階層。國家公僕是干政程度最低的類型，它嚴格地通過合法渠道施加影響；而精英統治階層則是一種對文官體系的取代，其目的在於建立軍事獨裁政權^⑥。

關於中國文武關係的理論探討也似乎沒有脫離上述的範式與分類。西方學者一般認為，西方的文武關係一般是「合作主義」(corporatism) 或者「自由主義模式」(liberal model)^⑦；與此同時，軍隊也是「非政治化」的。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的軍隊一直在政治之中扮演着積極角色^⑧。在中國的政治體系和政治話語之中，軍隊一直擁有着雙重身份：它既是保衛國家的暴力機器，又是從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相應地，它也同時具備了政治化與職業主義兩個面向，因此，有學者將解放軍稱為「具有職業屬性的黨軍」(a Party-army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⑨。

中國當代文武關係的核心在於黨一軍關係，這一點在中西方學者之中都已經成為共識。但是有關共產黨與軍隊互動的模式，在學界卻有一些爭論。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傳統論點是一種基於派系主義的範式，認為共產黨與軍隊是兩個「具有相互衝突利

益的、完全不同的實體」^⑩。他們常把文革時期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視作黨與軍隊的利益衝突，並且有一些學者以軍隊代表或人員在黨的機構或者代議機構中所佔的比例來判斷中國「軍隊接管政權的程度」^⑪。

不過，也有學者意識到黨與軍是不可分的兩部分，具有融合 (fusion) 的特性，兩者並沒有清晰的界限。軍隊的官員同時也是黨的官員，因此前述那種軍人在文官機構中佔高比例的情況並不意味着文官體系被軍人接管^⑫。在中國的語境中，這個比例只能被用於說明軍隊政治化的程度；而林彪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篡奪黨內的最高權力而非其他，因此毛與林的鬥爭也僅僅只是黨內的鬥爭而已，談不上是黨與軍隊的衝突。

二 變遷中的當代文武關係：政治化與去政治化之間

從中共建政之後的毛澤東時代到其後的鄧小平時代，再到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的文武關係經歷了變遷，這一點在學者的眼中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們對於這種變遷的方向似乎都莫衷一是。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毛時代至今，隨着中國政治的發展，軍隊在某種程度上經歷了身份的轉換——也就是經歷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並逐步增加了職業主義的元素。但是，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沒有迹象表明解放軍會脫離共產黨變成「中立的」或者「國家化」的軍隊，它依然是共產黨政權的政治體系和政治過程的一部分；換言之，軍隊在「政治化的黨軍」和「職業化的部隊」兩種角色之間存在着張力甚至是衝突。

(一)「黨指揮槍」的一般方式

從1949年建政至今，中共的確相對成功地保持了對軍隊的控制，以「黨指揮槍」的原則重建了「文官至上」的傳統。總的來說，共產黨對於軍隊有兩條控制線，其一是黨—軍控制線，它強調在所有層面上——不論高層還是基層、中央還是地方——黨組織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而軍隊的最高領導與指揮權歸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其二是上層—下層控制線，也就是軍隊的高層單位對軍隊的低層單位(如軍區、軍分區、警備區)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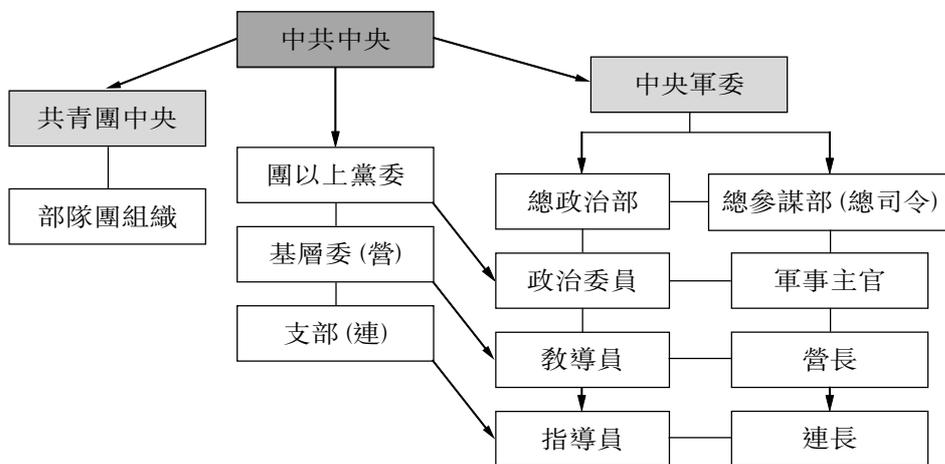
共產黨對於軍隊控制的實現主要是通過政治手段，在官方話語中亦被稱作「政治工作」。根據官方的定義，所謂「政治工作」意指「黨在軍隊中的思想工作與組織工作」^⑩，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寓黨於軍」。而政治工作的開展則仰賴於一系列的組織機構，主要包括總政治部、政治委員(政委)、黨委以及共青團等(見圖1)。在任何一个解放軍的部隊中都設有黨的機構，其日常工作主持者(相當於書記)是政委。而政委與本部隊的軍事主官(如軍長、師長等)是平級的，均屬該

部隊的首長。在日常工作中，兩人需分頭負責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工作，並共同擔負領導責任，而軍事主官的命令均必須由政委附署方得以生效。在兩人發生爭議時則需提請上級或本級黨委會議裁決。更重要的是，軍隊中的人事工作均由政委控制。而在地方軍事單位(軍分區、警備區)，部隊還需接受地方黨委的領導。此外，在四總部中的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設立政委，也體現了黨對於軍事業務的政治控制。

共產黨對軍隊實行政治控制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它的目的在於在軍中建立起對黨「先鋒隊」地位的認同，其方法是學習政治理論(或曰主流意識形態)；當然，由於軍隊的相對封閉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在軍隊中實行起來更為便利和有效。二是組織—人事控制，軍隊中的黨組織嚴格控制軍銜晉升、人員流動，以及地方軍事單位人員的調動，用以保證軍中的負責人對黨的忠誠。三是對於領袖的個人崇拜。對於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也能夠保證軍隊的忠誠並因此實現對後者的政治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比起制度

共產黨對軍隊實行政治控制的內容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和組織—人事控制。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也能保證軍隊的忠誠並因此實現對後者的政治控制，這點在毛時代尤其明顯。

圖1 中共對於軍隊的控制機構示意圖



說明：圖中的箭頭表示領導關係

化控制更為直接和在短期內更為奏效。這點在毛時代尤其明顯。不過在鄧小平去世之後的中國，這種因素正逐漸被削弱。

(二) 毛澤東時代的「人民軍隊」

毛時代的軍隊無疑是高度政治化的。從文武關係來看，當時的體制是一種黨、政、軍高度融合的列寧主義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中，黨的許多領導人（尤其是高層）出身於軍旅，「軍人文人化、文人軍人化」的現象是一種常態。

軍人在當時被嚴格地限定在共產黨的政治控制範圍之內。共產黨的任何政治運動都離不開軍隊，共產黨任何的政治話語都是一種對軍隊行為的約束，而共產黨的一切規範都嵌入到了軍隊日常運作之中。解放軍被定義為「人民軍隊」，其任務在於發動和打贏「人民戰爭」，其發展目標是「革命化、現代化與正規化」。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首次提出了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任務。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軍委明確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任務，並進一步論證了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辯證關係；認為軍隊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矛盾是現代化水平與未來戰爭的需要尚不適應。因此，軍隊建設必須以現代化為中心，正規化是軍隊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革命化的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三者相互依賴、相互促進，而現代化是中心環節^⑭。

「人民軍隊」一詞足以說明在共產黨政權之中，軍隊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黨和人民」的一部分。「軍政

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軍民一致」正是官方所認為的解放軍光榮傳統之一^⑮。換言之，解放軍不僅僅是軍隊，而且還要完成許多其他「非軍事的」政治任務，需要做許多「並不是軍隊應該做的事情」^⑯，比如參與工業、農業建設以及搶險救災等，還要幫助民眾解決其生活上的困難。但是這些「非軍事的」任務正是為了打贏「人民戰爭」而開展的，也正是群眾動員的方式之一，正如一位學者所觀察到的那樣^⑰：

作為一支人民的軍隊，它〔解放軍〕嚴格的軍事和非軍事任務是互相交織並相互聯繫的。也就是說，以下這種觀點是誤導性的：花時間幫助生產的活動是一種對「軍隊發動戰爭」這一主要任務的反對與損害。因為任何旨在加強軍隊與大眾之間關係的任務都會直接有利於其作為一支戰鬥力量的效度（efficacy）。

換言之，在軍隊之中也需要講求「群眾路線」^⑱。

此外，軍隊在毛時代更是一種符號：它代表了紀律、勤儉、不畏艱險、拼搏，以及光榮等。1960年代的一句著名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便可印證這種情形。另一個例證是，在當時，軍裝是神聖的標識，是權力的象徵^⑲。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軍隊政治化的頂峰。在當時，黨的機構遭到嚴重破壞，社會政治秩序無法依賴於文官體系的管制而維持，因此依照軍人干政動機的傳統解釋，軍隊在此時是介入政治的「良好時機」^⑳。的確在文革之中，軍隊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顯。儘管毛當時並不想建立一個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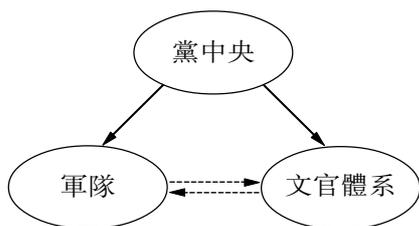
「人民軍隊」一詞足以說明在共產黨政權之中，軍隊並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黨和人民」的一部分。解放軍不僅是軍隊，而且還要完成許多其他「非軍事的」政治任務，需要做許多「並不是軍隊應該做的事情」。

統治集團 (junta)，但無可爭辯的是，在黨的機構重建過程中，軍隊的作用與1954年頒布《憲法》以來的任何時間相比都變得更大 (至少是更直接的) ⑳。在社會政治秩序 (尤其是在地方) 遭到破壞之時，中共提出了「三支兩軍」㉑的口號，要求軍隊介入文革。

不過，與西方軍人干政理論相反的是，在「三支兩軍」、林彪的「突出政治」五原則，以及軍隊要給政治工作「讓路」等政治語境之下，軍隊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行為體，也未變成懷亞特所謂的「國家監護人」——儘管有地方成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但是這些軍事管制的行為都是在黨中央 (主要是毛) 的命令之下 (而不是自主) 進行的㉒；而且在文革後期，正是軍隊幫助了共產黨以及其他文官機構的恢復㉓。

簡言之，毛時代的軍隊是懷亞特所謂的「國家公僕」，它受到黨 (中央) 的嚴格控制，大規模地捲入政治，並聽從於文官體系的命令，同時主要通過合法的渠道 (主要是共產黨系統) 影響政治。軍隊與除黨中央之外的其他文官機構的互動也是在黨治體系和黨中央的控制之下完成的，其核心正是前述的「文官至上」傳統 (見圖2)。此時的軍隊是政治的工具，職業主義是被忽視甚至是被排斥的。

圖2 毛澤東時代高度政治化的文武關係模式



黨治體系／「文官至上」的傳統

(三) 鄧小平時代及其後：軍隊回歸本職

儘管在建政初期，中共便提出了軍隊的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的主張，但是歷史清晰地表明，這種職業化的努力讓位給了「革命化」(或曰「政治化」) 的目標。

不過在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大) 之後，軍隊的政治化程度便有所下降：軍隊的黨代表比例從九大的44%下降到了32%㉔，也有學者認為這一下降幅度約為20%㉕。而在毛澤東去世以及鄧小平上台之後，這種軍隊「去政治化」的過程便隨着改革開放而加速。這種軍隊「退隱」的另一面則是職業主義的重新啟動。

一方面，經濟政治的轉軌，特別是文官機構的重建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文官體系的倚重，導致了權力向官僚機構流動，軍隊的作用在政治經濟生活之中日益減少。另一方面，中共從1980年代開始，啟動了裁軍計劃以及軍隊現代化計劃，在官方話語中體現為用「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替代「人民戰爭」㉖，這一計劃逐步將軍隊建設的重心轉向軍事技能與業務的提升。這種職業主義的轉向在1998年總裝備部的設立之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軍隊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政治，回歸了其軍事的本職。

這種身份重構的一個結果便是文武分歧的出現。有學者將其描述為：在國家從列寧主義國家轉向官僚多元主義的過程之中，文官與軍隊——尤其是黨與軍隊——之間的關係變成了相互需要的關係㉗。當然這種描述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是軍隊獨立於文官體系的自身特性確實逐漸顯現了出來，其主要的基礎之一是軍官與政治

毛時代的軍隊是「國家公僕」，它受到黨 (中央) 的嚴格控制，大規模地捲入政治，並聽從於文官體系的命令，通過合法的渠道影響政治。此時的軍隊是政治的工具，職業主義是被忽視甚至是被排斥的。

家在價值觀以及行為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軍人較之文人更加直接，更加情緒化^{②9}——這一觀念深藏於儒家思想之中。這種個性上的差異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表現出來。

另一方面，軍隊出現了自身的利益。在社會經濟增長與收入增加的大環境下，軍隊的待遇提升成為了軍人普遍關注的切身問題。另外，軍隊在1980至1990年代之間的經商活動，也使得軍隊逐步捲入經濟大潮，出現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其開辦娛樂事業以牟取暴利，甚至參與走私等活動，似乎也預示着軍隊有成為獨立於政治控制的利益集團的傾向。

在鄧小平時代，「六四事件」中所表現出的文武分歧擴大，使得1989年之後的共產黨加強了對軍隊的政治控制^{③0}，如通過「反腐敗」等政治運動，清除了許多軍隊之中被認為是不忠誠的官兵。但是在後鄧時代，中國的文武關係似乎也遭遇了一些困難。在1978年之後，中共放棄了採用「動員捲入政治運動」這種控制軍隊的方法，並且在1989年江澤民全面接管軍

權之後，領導人的個人魅力領導（鄧延續自毛）以及黨軍之間的個人關係網逐步被消解（江以及之後的胡錦濤均無軍事背景），因此黨對於軍隊的控制更加依賴於制度性和職位性的權力，而協商、利益交換和培植親信等新型手段日益被應用於保持黨對軍隊的控制之中^{③1}。

不過這樣依然無法阻止文武之間分歧的增長，1992年的「楊白冰事件」便是一個生動的例子。楊白冰事件主要表現為反改革政治家群體與軍人改革派之間的衝突。楊白冰被認為是在鄧小平南巡後「背着」江澤民提出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因而被解職^{③2}。近年來在具體公共政策（主要是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也能說明問題，這種分歧的主要表現在於軍隊領導人更注重民族主義，所以傾向支持強硬的政策，而文官體系更強調長期因素，因此主張妥協以及較為柔性的對外政策^{③3}。但是，以此來誇大軍隊和文官體系的隔閡，無疑是錯誤的。

目前的現實是軍隊仍在黨的控制下，高層的軍事領導人依然和黨中央高度融合，各級軍事領導人也時常宣誓對於黨的忠誠；黨的各項意識形態學習活動也能夠順利地在軍隊中開展，而從中央到地方也沒有出現軍隊挑戰黨中央與黨的路線的事件——楊白冰的最終下台體現了黨對於軍隊依然有着很強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民眾依然認同黨的領導，並且沒有對軍人干政的需求，因此軍隊僭越黨治體系底線的正當性並不存在。此外，武警的設立是一種實現「內部軍管」的替代方案，當社會秩序出現混亂以及發生災禍的時候，武警替代了原有的解放軍作為「前線」的主力介入其中。綜上所述，中國的軍隊仍然是政治化

目前的現實是軍隊仍在黨的控制下，民眾依然認同黨的領導，並且沒有對軍人干政的需求，因此軍隊僭越黨治體系底線的正當性並不存在。中國的軍隊仍然是政治化的，其與文官體系的分歧應被視作一種在「黨治體系之內的文化分化」。



在新華門站崗的武警

的，其與文官體系的分歧應被視作一種在「黨治體系之內文武分化」。

概言之，鄧小平時代及其之後的中國軍隊從「國家公僕」發展成了「政治勢力」，對政治可以施加一定的影響。根據懷亞特的觀點，軍隊甚至可以對文官體系實行一定程度上的「訛詐」^④。當然由於資料所限，軍隊是否有對黨或者其他文官機構進行「訛詐」不得而知，但是一定程度的分化肯定是存在的。由於1978年以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轉型，軍隊出現了自身的利益與訴求，因此它通過黨中央「輸入」其訴求，並依賴後者的「輸出」對文官體系施加壓力，並不奇怪。而在另一方面，由於文官體系的許多政策如今能夠影響到軍隊的利益，因此軍隊與文官體系的直接互動也有所增加。然而，這一系列的互動仍是在黨治體系中進行的，「文官至上」的傳統也未被破壞。

三 結論

以上討論了中國文武關係的理論與歷史，更重要的是討論了文武關係（尤其是黨—軍關係），以及這一關係在當代的轉型。其結論是，在鄧小平時代以及後鄧時代，軍隊雖然相比於毛時代有所「去政治化」，但依然未有出現脫離黨治體系形成獨立壓力集團的傾向。作為共產黨的功績之一，黨對軍隊的政治控制以及「文官至上」的傳統並沒有遭到破壞。

政治化與職業化是中國軍隊在發展與變遷之中兩個很難調和的目標，它們共同塑造了軍隊角色與身份衝突，其具體表現為作為黨的軍隊的依附性與作為武裝力量的軍隊的自主性

之間的衝突。另外，在本文的論述之中也可以看見一個弔詭卻又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軍隊愈職業化，似乎相對於黨的自主性就愈大，對政治過程的干預也有所增加。這似乎與西方理論中「職業主義軍隊干政傾向小」的結論是截然相反的。對此現象，我們的解釋是：當代中國軍隊的職業化程度雖與毛時代相比有所提高，但是它仍未改其政治化的本質，職業主義乃是從屬於政治需要的，或者說是工具性的。

此外，雖然有學者認為第四代領導人繼承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創設的文武均衡 (equilibrium) 的局面並保持了文武關係的穩定^⑤，但是未來是否會出現軍隊愈發獨立甚至成為壓力集團的現象，仍舊是一個值得去探討和關注的問題。

在鄧小平時代以及後鄧時代，軍隊雖然相比於毛時代有所「去政治化」，但依然未有出現脫離黨治體系形成獨立壓力集團的傾向。黨對軍隊的政治控制以及「文官至上」的傳統並沒有遭到破壞。

註釋

①②③④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304; 300; 299-314; 299-314.

② David Shambaugh, "Building the Party State in China, 1949-1965: 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125.

③ James Burk, "Theories of Democratic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9, no. 1 (2002): 7-29.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viii.

⑤② 陳明明：《所有的子彈都有歸宿：發展中國家軍人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19；51-53。

⑤③ Jerzy J. Wiatr,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Realities and Stereotyp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7, no. 103 (1985): 97-107.

⑦⑫ Fang Zhu, *Gun Barrel Politics: Party Army Relations in Mao'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8), 3; 9-11.

⑧⑳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Politics, Professionalism, Procurement and Power Projection", in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ed. 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4.

⑩⑰ 參見Dennis Woodward, "Political Power and Gun Barrels—The Role of the PLA", in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Bill Brugger (London: Croom Hel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8), 72; 71。

⑪ Yang Zh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the August Coup",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9, no. 1 (1992): 47-70.

⑬⑭⑮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治工作教研室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社會主義時期》（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9），頁2；67；107-109。

⑬ 參見侯樹棟主編：《國防教育大詞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引自江西國防教育網，<http://gfjy.jxnews.com.cn/system/2010/04/19/011360714.shtml>。

⑯ John Gitting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6-201.

⑰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

⑲⑳ Paul H. B. Godwin, "The PLA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China's Provinces: A Structur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s* 9, no. 1 (1976): 1; 3.

⑳ 「三支兩軍」是指：軍隊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以及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和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㉑ Graham Young, "Party Building and the Search for Unity", in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5-70.

㉒ Joan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armon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9), 3.

㉓ 江澤民在〈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93年1月13日）中詳細地闡述了該問題，參見江西國防教育網，<http://gfjy.jxnews.com.cn/system/2010/04/16/011353494.shtml>。

㉔ 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張愛萍甚少研讀上頭發的文件，不喜歡談論「文件精神」。參見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頁281。

㉕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eptember 1997): 527-68.

㉖ 參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5%AE%B6%E5%B0%86%E4%BA%8B%E4%BB%B6>。

㉗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i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Leadership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in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96-129.

㉘ Yu Bin, "The Fourth Generation Leaders and the New Military Elite",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oday's China: Swimming in a New Sea*, ed.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74.